政治科學論叢／第 90 期／民國 110 年 12 月／頁 73-116

普京政權下俄羅斯權力網絡與權力菁英分析*

許菁芸**

摘　要

2020 年 1 月梅德韋傑夫辭去總理職位，7 月 1 日通過全民公投修憲。普京總統巧妙地取消了俄羅斯憲法對總統任期限制的規定，從理論上講，他的任期將持續到 2036 年。然而，通過修改憲法和改組政府，此舉也具體顯示了普京的權力網絡 sistema 正在面臨危機：以往普京所操控的權力菁英團體已經建立起獨立於普京控制的私人網絡，而普京也漸漸地疏遠舊有的權力菁英，重用年輕且易於控制的科技官僚。俄羅斯是個網絡國家，俄羅斯式的網絡 blat 和權力網絡 sistema 對於普京政權下的權力菁英發展與結構影響甚鉅。因此，本文以俄羅斯特有的非正式網絡－blat，進而形成普京政權下的權力網絡 sistema，並以傳統俄羅斯的「連帶（無）責任」與蘇聯遺緒的「蘇維埃行政－命令文化」作爲俄羅斯權力菁英網絡 sistema 的網絡連帶鎖鏈，探討普京的權力網絡。之後，以菁英網絡矩陣分析普京權力菁英結構，最後檢視俄羅斯普京執政（2000 年）時期開始迄今俄羅斯權力菁英團體發展、轉變過程，並分析其未來發展。

關鍵詞：普京政權、權力菁英、網絡、blat、sistema

---

* DOI:10.6166/TJPS.202112_(90).0003
本文爲科技部個人型專題研究計畫「俄羅斯菁英政治與決策模式－以能源政策和中俄能源關係爲例」（MOST 107-2410-H-032-054-）之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舉辦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19 年會暨「現實主義、民粹主義與科技發展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作者非常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此論文悉心審閱並提供寶貴意見，提供本文修繕與更多延伸性的思考。

**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june0130@gmail.com。

收稿日期：110 年 9 月 6 日；通過日期：110 年 12 月 28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從 1999 年普京（Vladimir Putin）[1] 被提名爲俄羅斯總理，2000 年當選總統，從此開創了俄羅斯的普京時代。對當前俄羅斯政權的研究莫過於關注普京本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菁英及其對行政權力的影響變得越加重要。由俄羅斯權力菁英控制的最重要的軍事、情報、法律和經濟機構，將影響俄羅斯下一任總統的選擇及俄羅斯政局的未來發展（Sestanovich, 2020）。

在普京政權下，俄羅斯的「人治」色彩濃厚，普京在其掌權期間，積極地建構並鞏固其權力層級，並利用權力菁英間的鬥爭和傾軋來作菁英權力團體間相互制衡與自身權力鞏固的培養皿。法律出身的普京熟知如何以法律與制度來增加政權的合法性與支持度，[2] 普京曾於 2000 年就任總統時，公開發言要成爲憲法和法律的捍衛先鋒，所以可以此來理解普京爲何在 2008 年時他不修憲延長任期（維持政權合法性成本最低），而是提拔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當總統，因爲他當時權力強大，且能維持對權力菁英的操控。但是到了 2020 年即將面臨同樣的抉擇時，他卻於 2020 年 1 月撤換總理梅德韋傑夫，改任米舒斯金（Mikhail Mishustin），之後又通過修訂憲法來延長自己的權力，他的作法和以往執政風格迥異，著實令人費解。這是否暗示了 2008～2012 年間普京擔任總理期間，2012 年重返總統之位後的這十年間，俄羅斯的政治菁英與權力核心慢慢地發生了變化，普京開始在傳統權力菁英間漸漸有所疏遠，在普京政權表面成功背後，存在著對權力菁英穩定性的嚴重懷疑。

俄羅斯做爲一個「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權力菁英間的網絡與非正式運作深切影響所謂的「俄羅斯系統」（“the Russian system”）。L. Shevtsova 將「俄羅斯系統」定義爲「一種特殊類型的治理結構，其特徵包括家長式統

1　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一般在中文文章中常見音譯爲「普京」，但作者認爲「普欽」更合適。本篇文章使用「普京」，係爲了與本刊其他作品維持音譯的一致性。

2　普京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現聖彼得堡大學）國際法學系。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治（paternalism）、專制、與外界隔絕、渴望成爲大國。該系統的核心是全權的領導者，凌駕於法律之上，將所有權力集中在他手中，沒有制衡的問責制，並將所有其他機構限制爲輔助性的行政職能（Shevtsova, 2003: 16）。」

蘇聯時期將此系統更加強化，基於列寧的菁英統治概念，蘇聯政治制度的高度結構化和集中化，共產黨「職官名錄」（nomenklatura,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對於政治菁英的維持和遞補擁有一定的規則。1991 年蘇聯解體後出現的新生的市場經濟和脆弱的民主制度，標誌著對共產黨統治的決定性背離及與過去的專制徹底決裂。但是俄羅斯的政治菁英卻大部分被保留下來，因此普京領導下的個人專制政權的出現其實並不意外。再者，費雪（M. S. Fish）更指出了俄羅斯政經系統的結構性因素，例如對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腐敗和公民社會的軟弱，使得俄羅斯再回到專制統治，權力掌握在少數菁英、寡頭或單一獨裁者手中（2005）。

G. L. Field 和 J. Higley 將菁英定義爲「在公共和私人官僚組織中佔據戰略位置的人（1980：20）」。因此，在分析構成後蘇聯時期俄羅斯權力菁英之前，必須確定菁英行使權力的「戰略位置」和關鍵團體。普京在 2000 年擔任總統以來，對於自身與菁英權力的維持不餘遺力，作者認爲普京權力菁英團隊內部的嚴重分歧是一個特點，而不是俄羅斯統治方式的缺陷。在其執政期間，普京與其說是領導者，不如說他是在權力菁英競爭團體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並堅持自己的中心地位，這也是作者對於普京的權力網絡（Putin’s power networks）的理解。

普京的權力網路，嚴格來說不應該以普京之名將其個人化，因爲俄羅斯領導人對其權力網絡的建構都是起於羅曼諾夫王朝初期的幾個世紀的俄羅斯政治文化：俄羅斯人不信任政治機構，在與官僚打交道時習慣依賴他們非正式網絡－blat（блат）、互惠互利和對「自己人」（свой）的忠誠受到高度重視。除了對制度的不信任之外，俄羅人也缺乏對法律的尊重和對政治的疏離，而自相矛盾的是，同時還渴望有一個強大的領導者來彌補制度的破洞（Ledeneva, 2013）。因此，俄羅斯權力菁英最主要問題是非正式性（informality）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俄羅斯，官方行政制式運作遠沒有人際關係重要（Stanovaya, 2020a）。而這種情況並非由普京引入，而是在俄羅斯存在多年。要探討這些問題，必須分析俄羅斯的非正式網絡 blat 和權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網絡 sistema 特有的社會與政治文化，才能進一步剖析普京政權下的權力菁英發展與未來變化。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其一、本研究將探討網絡理論，和網絡國家的非正式性建構權力菁英網絡矩陣。

其二、以俄羅斯特有的非正式網絡－blat，進而形成普京政權下的權力網絡 sistema，並以傳統俄羅斯的網絡連帶鎖鏈－「連帶（無）責任」與蘇聯遺緒的「蘇維埃行政－命令文化」探討普京的權力網絡。

其三、以菁英網絡矩陣分析普京權力菁英結構，並檢視從俄羅斯普京執政（2000 年）開始迄今，俄羅斯權力菁英團體發展與轉變過程，分析普京政權未來發展。

貳、「網絡」（networks）與菁英網絡類型矩陣

一、「網絡」與「網絡國家」

(一)「網絡」定義與發展

1950 年代始，「網絡」的概念在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被廣泛地討論，但在組織行爲的研究中可能起源更早。1930 年代，F. J. Roethlisberger 和 W. J. Dickson 在「管理和工作者」（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中已指出並強調組織中非正式網絡的重要性（Roethlisberger & Dickson, 1939）。1970 年代，網絡分析途徑成爲學術研究的一新興領域。H. White 及其研究夥伴，企圖從網絡關係中探討並分析社會結構，透由個人社會網絡來確定「位置」（position）或「角色」（role）（Nohria, 1992）。受到 H. White 的影響，社會網絡分析發展出兩個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一是 M. Granovetter (1973; 1985) 將關係分爲強連帶（strong tie）與弱連帶（weak tie），並認爲上述兩種不同的連帶在人與人、組織與組織，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另一個則是 R. S. Burt (1992) 的結構洞理論（structural hole theory），從理性的角度出發，強調社會網絡的功利性與工具性作用，只要一個人處於應用結構洞愈多的位置，關係運用的優勢愈大，獲得的回報機率愈高。

臺灣大學圖書館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社會與組織間網絡的參與者不但相互依賴且關係複雜，其行爲、互動模式與交易情境亦具有多變、連動的特質；因此，在網絡研究有靜態的點線面的研究，以區分網絡節點（nodes）、連帶（ties）、結構（structure）等基礎，以及網絡結構中的單位動態發展，例如組織角色（ego）、雙元互動（dyad）與網絡等動態關係發展條件之作用與組合（Easley & Kleinberg, 2010: 54-58）。

從以上的網路研究來看，「網絡」的定義極爲廣泛與模糊，J. C. Mitchell (1969) 將「網絡」界定爲行爲者（包括個人或是組織）形成之特定型態的社會關係（例如友誼、資金轉移、交疊的成員資格）連帶的一組節點，這些「連帶」涵蓋行爲者之間的利益與權力關係等，透過這些關係可進行資源轉換、資訊交換等互動行爲，並形成獨特的資源相互依存關係（Laumann et al, 1978: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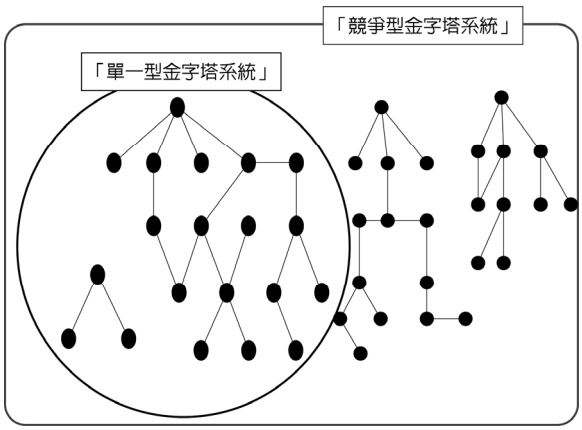
(二) 網絡國家的非正式性

基於網絡的特性，Vadim Kononenko 和 Arkady Moshes 引入了「網絡國家」的概念來描述俄羅斯的權力治理，「網絡國家」概念已被用來表明國家機構已被權力網絡滲透，這些權力網絡擴散、分解和多元化非正式性運作（informal practice）（Kononenko & Moshes 2011；Steen, 2003）。

非正式性是一個整體的抽象概念，它可細分爲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非正式網絡（informal network），與非正式運作（informal practice），三種同時運作的因素，而非正式網絡是非正式制度與非正式運作的節點與連帶。除了生活所需的非正式網絡，在網絡國家的政治體制上也會形成非正式性的權力網絡。在非正式性下產生了菁英之間利益分配與政權穩定的需求，但是也造成公領域及私領域逐漸模糊的情況發生。國家資源被菁英私用、個人主義加上層級制度，造成菁英們爭奪權力並且促進恩庇關係。Henry E. Hale 認爲前蘇聯國家在解體後的政治情勢所呈現出來的情況是恩庇政治盛行的場面，並且在政治體系中會形成金字塔結構。在金字塔結構（見圖 1）中，每個黑點代表著個體（節點），黑點之間的線條表示強制性和交互利益的關係（連帶），垂直線表示相對的隸屬關係與權力。最上層的黑點代表著權力最高的恩庇主（或領導者），越往底層的黑點表示侍從者，或是介於上下之間的中間人，而越往底層則有越複雜的的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圖 1　網絡國家之金字塔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Henry E. Hale (2014: 64) 自行改繪

從屬關係。水平點或線代表通常處於同一階層的個人或團體，此種圖像化的網絡關係被比喻爲「權力金字塔」（pyramids of authority）（2014 : 61-66）。

在前蘇聯國家中，總統制比較容易形成「單一型金字塔」，通常國家的主要網絡會構成最主要的金字塔，其中恩庇主的位子是由國家領袖來擔任。並且在主要金字塔之外的網絡會被有系統地邊緣化，因此無法與主宰政局的金字塔結構抗衡。而半總統制或議會制政權則傾向於「競爭型金字塔」，此意味著單一網絡佔領總統一職的重要性並不如總統制一樣具有影響力，也無法成爲一個唯一具有影響力的網絡，在這情況下，第三勢力網絡可以藉由製造謀略空間（maneuvering room），藉由挑撥或結合其他網路使自己成爲有力的網絡。

(三) 菁英團體之網絡類型矩陣

社會連帶（social ties）在私領域與公領域中都存在，權力網絡內部可能有更強或更弱的連帶，而這些連帶皆有助於超越公私領域的界線。從前述之 M. Granovette 的強連帶與弱連帶的關係尺度來看，強連帶主要維繫著群體與組織內部的關係，能帶來認同感與信任感，強連帶一般與家庭、內圈和強頻率的接觸有關。而弱連帶則使人們在群體與組織之間建立起聯繫，並得到不重複的訊息與資源，因此具有弱連帶關係的人往往處於訊息橋

臺灣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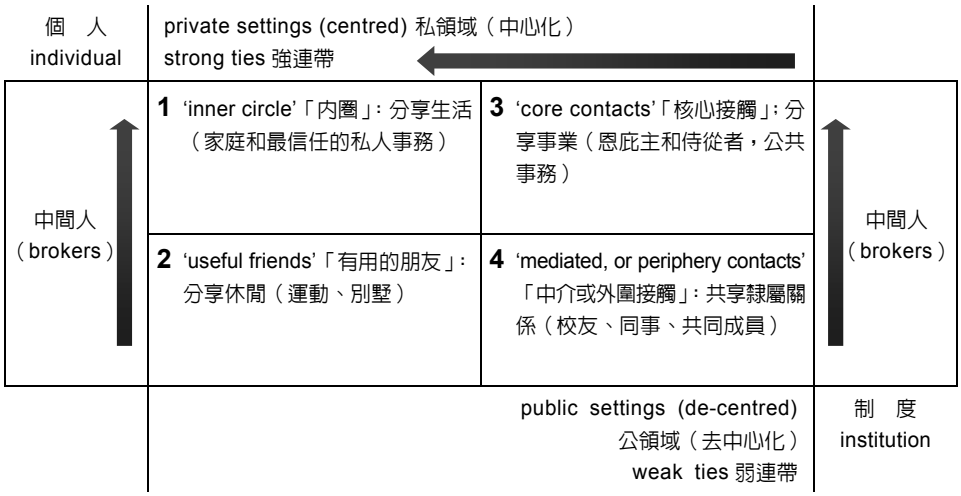
（bridge）的優勢，擁有比他人更豐富的訊息與資源，而且弱連帶具有較低的個人接觸頻率，具有層級隸屬關係的特徵，例如職業、公司、成員資格、校友會或同袍（Granovetter, 1995）。

Alena V. Ledeneva 輔以 M. Granovette 的強連帶與弱連帶的關係尺度，和從私領域到公領域，代表了網絡運作的一系列環境，從完全親密到與之相關的制度配置，建構了一個菁英團體的網絡類型矩陣。這個類型矩陣從關係尺度與公私領域的交集提供了四種網絡類型：中心化網絡與個人－「內圈」（inner circle）、強連帶和私領域相關－「有用的朋友」（useful friend），弱連帶和公領域相關－「核心接觸」（core contacts）、及去中心化網絡與制度－「中介或外圍接觸」（mediated, or periphery contacts）（2013：55-56）。但是作者認爲 Alena V. Ledeneva 的菁英類型矩陣並沒有說明各個菁英類型間如何連結與權力趨向（趨於個人或趨於制度），因此作者就該網路矩陣增加了中間人的滲透來貫穿菁英圈，並用箭頭來顯示菁英團體對權力的趨向（見圖 2）。在網絡國家中，強連帶的「內圈」是與領導核心者（個人）連帶關係最親密的團體，包含親人、密友。「有用的朋友」雖也是強連帶，但往往帶有利益關係的結合，且通常需要經由領導核心者信任的中間人來牽線。弱連帶是因制度而接觸，「核心接觸」通常指因職務圍繞在領導核心者旁邊或是擔任制度體系重要職務者。而「中介與外圍接觸」通常是指在制度內較易成爲晉身之階的機構，但是要能在職務上跨越至上層，仍須經由中間人來引介。

一般而言，網絡的特徵在於中心性（領導核心），即個人與同一領導核心的連帶關係程度以及網絡中個人與中心之間連帶的強度，也就是接觸頻率。個人可以通過接觸最頻繁的連帶關係來識別網絡的核心，而通常權力網絡是以處於層級最高職位的人爲中心。「內圈」和「有用的朋友」即是與個人有著強連帶的網絡，但是「有用的朋友」通常需經由中間人來向上連結領導核心（見圖 2 左方之垂直向上箭頭）。而在去中心化性質（低中心性）的網絡中，所有網絡的節點會與制度相互聯繫在一起，而這樣的網絡類型比較常見於西方國家的官僚體制之中，「核心接觸」和「中介與外圍接觸」在網絡國家雖然是因制度而成的弱連帶，但是「核心接觸」菁英會因爲自身傑出的行政能力而與領導核心密切接觸，「中介與外圍接觸」同樣也常會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圖 2　菁英團體的網絡類型矩陣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Alena V. Ledeneva (2013: 55) 修改繪製

經由中間人作爲晉身「核心接觸」的橋樑（見圖 2 右方之垂直向上箭頭）。而這四類菁英在網絡國家中都會積極地向個人（領導核心）靠攏去獲得權力（見圖 2 上方於強連帶之橫向向左箭頭，而弱連帶下方並無橫向箭頭，而是只有右方之向上箭頭）。

當公共和私人領域之間的劃分明確時，網絡分爲主要在私領域運營並服務於私人需求的網絡，和主要在公領域運營並服務於公共需求的網絡。然而，如果公私領域之間缺乏明確的界限，網絡可以同時爲這兩個領域提供服務。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公私領域之間往往沒有明確的劃分，經濟短缺導致對私領域的個人網絡的過度依賴。在後蘇聯時代，權力菁英也有缺乏公私分工的特徵，私人生活、時間表和生活方式完全取決於所隸屬的菁英團體（Krystanovskaya & White, 2005）。

參、俄羅斯式的網絡 blat 與權力網絡 sistema

俄羅斯式的網絡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俄羅斯的社會與人際網絡與聯繫機制 blat（本文稱之爲「互惠共生」）和俄羅斯權力網絡 sistema 是沙俄和蘇聯歷史的遺緒，至今形成俄羅斯特有的政治文化與菁英模式。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蘇聯時期，法律政治文化在制度建設中的突出作用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重點在於俄國民眾的行爲與態度的連續和嬗變。民主對於後蘇聯時期人民是新觀念，但後蘇聯人民卻仍習慣於接受壓榨、卻能夠提供保護的舊「強勢型」威權的領導（Гудков, 2015；Мельвиль & Никитин, 1991）。而私人財產的「新」觀念是與「blat」和「sistema」這一「舊」的紐帶相互聯繫的。因此，新舊文化之間並不必然會發生衝突。制度框架的迅速變遷反而會刺激人們向最基本的模式回歸，轉而支援連續性（Афанасьев, 2000: 60）。

新制度主義學派認爲，關係網絡現象的再生是理性化的結果（Ясин, 2002）。蘇聯體系的崩潰造成了一定的制度眞空，於是，人們自然會尋找某種策略，以應對制度缺陷。這類策略既依靠現存的非正式運作，又依賴新興的制度，從而補償新型市場民主制度中的漏洞與斷層。「俄羅斯國家結構的制度缺點……已經被各式各樣的非正式模式所填補、替代或者補償，而這些模式正是權力的縮影、行政與政治關係的呈現」（Соловьев, 2008: 155-156）。里夫金納（P. B. Рывкина）認爲，經濟領域中的「制度眞空」，往往與社會領域中的「道德眞空」相伴隨，而這種眞空是因爲民眾的貧困化和社會群體的邊緣化所引發的（1999：18）。因此，「blat」和「sistema」在後蘇聯背景下的復興無疑是一個指標，從中既可以看出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所具有的牢固吸引力，也可以看出“blat”和“sistema”的內容與形式隨著後蘇聯時期的變革而不斷變化。

一、俄羅斯式的網絡：blat（互惠共生）

在俄羅斯，blat 是一個通俗的用語，[3] 它表示通過與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來完成事情的方式，包括使用人脈，牽線和交換「恩惠」（favors）。blat 的

[3] Blat 有些人會翻譯成「關係」，但作者認爲中文「關係」，和俄羅斯的 blat 雖有些意義相近，但仍不是一樣的解釋，作者怕避免混淆，所以使用 blat 原文，另一原因是 blat 在俄文中有很多的含意且連俄羅斯人也很難解釋清楚。在俄語中，常見的 blat 的意義包括：(1) 垂直或層級式模式，例如保護和庇護；(2) 水平或互利交易；(3) 兩邊牽線的中間人操作；(4) 交換「恩惠」，獲得透由友誼和其他具有約束力的關係的相關資源；(5) 諸如互助，相互理解和訊息交流之類的社交模式（Ledeneva, 1998）。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用索引

實際運作兼具使用人與人聯繫方式或網絡的社交性，但具有獲得影響力或獲取有限資源的工具性，社交性和工具性之間的界線模糊不清，凸顯了 blat 的矛盾性。固定進行此類交流的人被視爲中間人（brokers 或 blatmeisters, блатмейстеры），而不是朋友（Ledeneva, 1998: 144-155）。中間人的性質在俄羅斯關係網絡 blat 中特別重要，因爲俄羅斯的 blat 基本性質是封閉的，也因爲蘇聯時期史達林推行檢舉制度，導致 blat 和 blat 間基本上是不信任的，blat 和 blat 的接觸都必須有雙方都信賴的中間人才能連結。

我們可以從蘇聯體系的三個特點來解釋 blat 的普遍性。首先，blat「互惠共生」是以非正式網絡來調節社會供需並在社會規則所能容忍的約定俗成下所達成的廣泛共識。中央計劃經濟和隨之而來的短缺促使人們使用「恩惠」來獲取每日必需的食物，商品或服務。因此，出現了雙重標準：儘管通過個人渠道例行的資源再分配不是非法的，但它也不是完全合法的。

其次，由於蘇聯對國家財產的壟斷，而使得公和私領域之間的界線模糊不清，也常常地不自覺（或是自覺但不認爲有何不妥）的越線。每個擁有裁量權的「權力看守者」都可以決定只給「我們」恩惠，從而將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線重新定義爲「我們」與「他們」的更有連帶關係的二分法。

第三，由於計畫經濟的集中和封閉性，增強了「我們」和「他們」的心態，規範了雙重標準，於是 blat 間的交易又可分爲圈內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blat 圈內人（強連帶）被視爲朋友間的連結，blat 圈外人（弱連帶）則是將公領域資源重新分配到私領域網絡中。這種認知上的矛盾性是既可維持利他主義，又可同時參與有利於「互惠共生」的經濟。

Blat 網絡的大眾化，可以用法國社會學大師 Pierre Bourdieu 所用的術語「誤認知」（misrecognition）來解釋這種「對現實視而不見」（being blinded to reality）的能力，亦可將稱之爲「誤認知效應」（misrecognition effect）。當支配／被支配的結構也內嵌於個人的稟性中，個人會以支配／被支配的結構性視野來觀看世界，並視其爲理所當然，此即爲所謂的「誤認知」（1989）。簡單說，「制度讓我做」和「每個人都做」之外，短缺和其他物質限制、相對剝奪和不公平相關的條件往往成爲「誤認知效應」的成因，經過時間的洗禮，就會形成合法制度和隱性規則之間的共生關係。

後蘇聯的經濟轉型破壞了促成 blat 普遍化的蘇聯體系。與社會主義有

臺灣大學圖書館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關的安全感和長期計劃經濟的不復存在，充盈的商品和資本市場已經可以爲「獲取恩惠」定價，blat 的工具性似乎已不復存在。但是，如果認爲，一旦中央計劃經濟政權不再存在，就不再需要替代貨幣或不需廣泛使用非正式網絡 blat，市場將會代替過去由非正式網絡執行的功能，這也是太過獨斷。觀察俄羅斯的社會現況，不僅網絡的使用並沒有減少，反而實際上增加了，特別是在某些新領域，如獲得工作、醫療保健、教育等仍然很重要（Miller et al., 2001；Rose, 2001）。

也許很多人將 blat 的非正式運作，歸責於社會主義的遺緒，但是，卻也不能否認非正式運作對政治制度的功能及其對解決個人問題的有效性。但是，後蘇聯時期，社交網絡已開始被富人和有權勢的人所佔用，對窮人來說變得越來越難進入。帝俄與蘇聯時期一個底層相連、頂層孤獨的社會已經在後蘇聯時期變成了底層孤獨並在頂層密切連接的社會，而這也說明 blat 在後蘇聯時期，已漸漸轉變爲專爲高層服務的「權力網絡」— sistema。

二、俄羅斯式權力網絡：sistema

Sistema 是俄羅斯權力網絡的統稱，[4] 代表著對權力和治理體系的共同理念，但是卻無法明確的解釋。儘管 sistema 的含義含糊不清，但「治理系統」（sistema upravleniya,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的簡寫術語是最常見的。在狹義上，它意味著「權力」或是國家機構的權威。在廣義上，sistema 遵守官方制度和正式程序，但也遵循不成文的規則和實踐規範。其矛盾性來自於權力的晦澀本質，一方面來自俄羅斯權力網絡的效力和複雜性，另一方面來自國家制度的不完善。

Alena V. Ledeneva (2013) 認爲 sistema 擁有下列特點：

1. 鑲嵌性（Embeddedness）

雖然權力網絡的運作在法律和制度有正式的規定，但也同樣依賴於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成文規則、社交網絡和非正式規範。使用網絡不是個人

[4] Sistema 是俄文的直譯，作者不使用英文 system，或是直接翻譯成中文「系統」的原因，在於 sistema 在俄羅斯也是帶有很多的意涵，如果使用英文或中文翻譯，反而會誤解或不易明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選擇，而是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網通用的方式，所以 sistema 是被鑲嵌在俄羅斯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運作之中。

2. 滲透本質（Diffuse nature）

權力網絡滲透本質能貫穿正式和非正式層級，讓兩種型態的層級沒有固定的界線，例如，雖然氏族層級（clan hierarchy）一般而言是垂直的，是上至下的控制並與處於高位者有強連帶，但是網絡可在去中心化的模式中依賴弱連帶。因爲網絡不僅可以當跨氏族的橋樑，亦可當跨制度的橋樑。而利益與資源的結合或菁英團體間的競爭就會產生重疊的界線和滲透的運作方式。

3. 複雜性（Complexity）

分配和動員權力是依照網絡原則和層級來組織的，因此 sistema 的構成是極其複雜，因此，即使是擁有正式和非正式權力的領導者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改變 sistema。

4. 保密性（Anonymity）

權力網絡隱藏在「連帶（無）責任」（collective (ir)responsibility，以下解釋）背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權力網絡基於使用非正式運作、影響力和槓桿原則來操縱制度表面背後的財產權與龐大利益。國家及其權力網絡的保密性是有其意涵的，因爲私人化的權力網絡渠道的長期影響是在眞正的和正式的權力中心之間造成差距，最終削弱制度的力量及其可管理性（Ledeneva, 2013: 19-24）。

權力網絡最大的作用爲控制資源和驅動菁英，而它們構成了 sistema 有效的治理模式，但同時也爲俄羅斯的現代化帶來了強大的阻礙。[5] 因此，

---

[5] 俄羅斯現代化的矛盾在於俄羅斯在某些方面（如太空科技、核子技術）已經是現代的，甚至是後現代的。但是學術文獻中，俄羅斯「前現代」（pre-modern）卻與傳統的治理模式有關，所以我們不應該僅僅從官僚主義的私人化或恩庇侍從關係的角度來研究俄羅斯的權力網絡，它們還與依賴私人網絡（blat）來彌補制度缺失、以私人信任來替代對官方機構的不信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俄羅斯權力網絡 sistema，其非正式性的傳統，除了前述的 blat 外，貫穿俄羅斯歷史的政治文化 krugovaia poruka (collective [ir]responsibility)，也就是「連帶（無）責任」[6] 和蘇聯時期的「蘇維埃行政－命令文化」（Soviet administrative-command culture）則是維繫權力網絡 sistema 連鎖控制的鎖鏈。

(一)「連帶（無）責任」

「連帶（無）責任」是俄羅斯自帝俄時期、蘇聯時期，沿襲至今的一種特殊社會網絡的維繫機制，其描述的是一種情境，特定集團或網絡圈中，所有成員對集團中的個體成員的行爲與責任負有連帶（無）責任，相對應的，每個個體成員也對集團的整體行爲負有連帶（無）責任，因此集團成員的生命與命運就不可避免地緊密相連。而沿襲至今，「連帶（無）責任」指涉的是一種行爲或關係模式，由於這種關係模式的存在，個人被視爲社會單位（這個單位可以是團體、網絡、家庭或者黨派）中的一分子，而不是自主的個體。

「連帶（無）責任」，最早發端於古俄羅斯社會，它最初是對農奴的連鎖控制的管理方式，在蘇聯時期和後蘇聯時代，「連帶（無）責任」變成在 blat 間交易中相互包庇、或牽制、或共生共榮的行爲與機制（Ledeneva, 2011: 91-114）。

審視俄國歷史，「連帶（無）責任」其實是在以氏族爲主要的政治經濟單位的時期出現，[7] 這一模式爲上層統治團體以最小成本來施展行政與財政控制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工具。G. L. Yaney 認爲，「連帶（無）責任」實質

---

6 Krugovaia poruka 此詞可以直譯爲「連帶（無）責任」、「集體（無）責任」、「連鎖控制」、「掩護」等意義，但是探索其眞正的含義，作者以「連帶（無）責任」稱之，是爲了與網絡理論中的行爲者在網絡結構上是以節點來呈現，節點之間的連帶則表達行動者之間的關係與流向。因此，「連帶（無）責任」可以更進一步點出網絡的重要性。這個詞有兩個意思：在沙俄時期，可以單單翻譯爲「連帶責任」，但在蘇聯時期至今，就包含雙含意：「連帶責任」和「連帶無責任」。

7 氏族作爲一個整體，對繳納貢品負有責任，氏族每個個體成員都有義務上繳。隨後，各個氏族形成以基輔爲中心的國家，然而，爲了追求行管理的有效性，「連帶（無）責任」模式依然被統治階級保留下來並訴諸實踐。

臺灣人文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上是俄國政治制度中的一種基本元素（1973）。

在沙俄時期，「連帶（無）責任」的運用模式可以分爲兩大類：犯罪型和財政型。[8] 而在蘇聯時期，「連帶（無）責任」產生了某些程度的變化，在史達林統治時期，由於大整肅之故，檢舉制度已經成爲中央控制地方機關的手段，因此「連帶（無）責任」成爲官僚集團防止被檢舉的自衛性措施，是官僚們自我保護、壓制批評的工具，而官僚們也開始選擇依附「大老闆」（big boss），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官僚們按照非正式運作行事來明哲保身，因爲他們明白，違反檯面下的規則的後果遠比違反正式制度嚴重許多，每個「大老闆」在基層上都有自己依賴和信任的親信，而後者完全效忠於他。在「連帶（無）責任」的約束下，忠誠度變得個人化並由網絡來保護（Fitzpatrick & Gellately, 1997；Hosking, 2004）。

(二)「蘇維埃行政－命令文化」

經濟學家和前莫斯科市長波波夫（Gavriil Popov）指出「行政－命令系統」指的是蘇聯的治理方式：集中式、官僚化、行政式分配資源，命令式動員幹部（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2005）。

可蕊希娜（Т. П. Коржихина）認爲「行政－命令系統」的特點包含：(1) 蘇聯地方政府機構的作用減弱，中央集權（實際上是個人化的權力）才是政治中心；(2) 由於大規模鎮壓和行政調動資源而導致的系統的緊急權力極度擴張；(3) 對行政機構的不斷監督、指示和控制，國家機器的官僚化及其與黨的機器合併，其結果被稱爲「黨國」（party-state）；(4) 落實「職官名錄」任命任命原則：國家官員由各級黨委審查、批准、推薦和確認；(5) 幹部（官僚）缺乏敬業精神、經驗不足和個人依賴性，因爲選拔是基於「適合系統」（fit the system）、忠誠和政治資歷的原則，而不是基於人才、技能和管理能力（1992：4-26）。

違反和背叛「職官名錄」菁英利益會受到嚴厲懲罰，並將其排除在「職

---

[8] 犯罪型的「連帶（無）責任」模式指的是如果某一地區發生了犯罪行爲，那麼該地區的所有居民都要繳納罰金。到了 17 世紀，「連帶（無）責任」這一模式主要運用在財政事務，尤其是稅收。如果個體不能或者不樂意交稅，那麼這個缺口將由各農村或村莊其他人分攤。對國家來說，連帶（無）責任制能夠有效地維繫對農村的財政控制（Andrle, 1994）。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官名錄」之外（Тимофеев, 1993: 6-7）。因此，蘇聯時期，口頭和個人命令曾經比書面法令（указы）和指示（распоряжения）更重要，並且必須更嚴加遵守，它們在後蘇聯時期仍然佔有相當的重要性（Colton, 2007: 325）。儘管當今的政治體制正式宣布支持憲法權利、權力分立、司法獨立和財產權保障，遵守非正式的口頭命令或指示，仍然是治理的主要特徵。

三、普京的 sistema

從蘇聯解體後，葉爾欽擔任總統，俄羅斯從極權向民主制度過渡，但是其權力網絡卻延續著蘇聯的菁英和遺緒。因此，在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新舊菁英雖大部分不是「同一」，卻是「同源」（吳玉山，2007：83-84），共同有著蘇聯傳統政治結構與文化的遺緒，但也延續著內部權力菁英嚴重分裂的特點。

1990 年代，葉爾欽政府試圖將西方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引入俄羅斯來打造新菁英。這對年輕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對老一輩則未然，他們看到自己的生活水準直線下降並渴望蘇聯時代的穩定，因此，在葉爾欽第一任總統任期期間（1991～1996）期間，因爲民主轉型成效不佳和實施劇烈的經濟改革，造成了內部菁英嚴重分歧。1993 年 10 月砲轟國會後，政府成員大幅換血。政府成員的頻繁更替大大減弱了權力菁英對總統的個人依附和忠誠度，這也是造成葉爾欽執政後期俄羅斯政局不穩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次總統任期（1996～1999）間，由於葉爾欽嚴重酗酒，健康不佳和政治上的孤立，葉爾欽更加依賴和信任自己身邊的親信和「家族」（“family”）菁英團體，而不同菁英團體與反對勢力間的分裂更爲嚴重。

普京時期，俄羅斯的菁英網絡開始緊密連結，非正式團體（informal groups）承攬決策權，自身構成一個制衡體系（Viktorov, 2014）。Sistema 並非由普京引入，而是在俄羅斯存在多年，只是在普京時期，這些權力菁英網絡的特點透由普京的管理手腕，而更加地明顯，所以，在普京時期，這種對權力網絡的治理依賴被稱爲普京的 sistema (Putin’s sistema)。[9]

[9] 在普京的 Sistema 的研究中，俄羅斯的權力網絡也有被稱爲「氏族政治」（clan politics），因爲氏族與恩庇侍從，及與地域性相關聯，並且確實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出一些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普京的 sistema 是把金字塔結構、對普京的個人忠誠度和對權力網絡的調節控制結合起來，普京的角色相當於權力網絡的仲裁者，且可以通過正式的從屬關係和官方職位來追求非正式的利益。因此 sistema 受益於層級控制，但也依賴於網絡的強度、靈活性、適應性和配置，從而整合了層級間垂直和非層級間平行的權力控制。忠誠度是普京的 sistema 最注重的特質，此忠誠度已發展出對恩庇主的個人忠誠傾向，並帶有「保護」的承諾，而個人忠誠有著將非正式命令置於正式法律之上的服從特質（Kryshtanovskaya & White, 2005）。

此外，普京的 sistema 之所以有別於俄羅斯或蘇聯其他領導人的原因，有以下特點：

(一) 普京政權期間內部權力菁英很少置換

自普京上台以來，克里姆林宮一直是甚少去觸及權力菁英體制。首先，菁英變革在俄羅斯政治史都常常會對領導人造成傷害，因爲被輪替換的權力菁英常常會成爲反對派，而出現政治緊張，如同蘇聯解體前的戈巴契夫時期和俄羅斯獨立後的葉爾欽時期，且在梅普共治時期（2008～2012）再次發生（Viktorov, 2014）。因此，普京的 sistema 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創造了一個平衡且彼此競爭的俄羅斯權力菁英（Tefft, 2020），並在通過在地區任命「代理地方行政首長」來實施中央至地方的垂直權力體系。[10] 其次，普

親屬關係、裙帶關係和封閉性的特點，但是作者認爲葉爾欽後期的「家族」菁英派系或可認定爲氏族政治，但是對於普京的 sistema 而言，雖然普京的權力網絡也是傳承於傳統的氏族結構，但有極大的不同點在於其權力網絡不是基於血緣、婚姻關係，而是更具多向性（multi-vector），因此更加機會主義、不穩定和難以預測（Collins, 2006；Schatz, 2005；Sharafutdinova, 2011），所以不能以「氏族政治」稱之。

10 在 2012 年後統一地方選舉時程後，地方行政首長任期屆滿後至 9 月份選舉的這段時間出現了行政首長職位的空缺，由於法律沒有規定這段時間行政首長如何產生，於是中央在這段空缺期任命了一批代理行政首長。此外，行政首長提前辭職或被解職也會造成代理行政首長的出現。代理行政首長由中央任命，獲得中央扶持，再加上提前履職可以掌控地方行政資源和經濟資源，所以在實際參選中有較強競爭力，很容易在選舉中獲勝。因此，從 2012 年至 2018 年間除伊爾庫茨克州和濱海邊區代理行政首長未獲勝外，其餘全部成功當選。因此，普京利用對地方行政首長官的任命權和免職權，將大量年輕的科技官僚或執政經驗豐富、能力強的菁英安插到各聯邦主體任代理行政長官的現象越來越多。

臺灣人文社會學期刊資料庫

京需要權力菁英的支持才能繼續並順利掌權，俄羅斯的歷史已經證明了強大的菁英對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Avdaliani, 2019）。因此，俄羅斯的政治穩定和合法性建立在權力菁英支持普京領導的共識之上（Tefft, 2020）。這也可以解釋與制度化和正式的銓敘程序相比，個人和非正式關係，以及與總統的接觸和忠誠佔有首要地位。

(二) 意識形態的掌控

俄羅斯是個意識形態非常複雜的國家。康弗斯（Philip Converse）曾提出的信仰體系（belief system）概念，信念體系是「思想和態度的組態在其中通過某種形式的約束或功能獨立性結合在一起」（Lussier, 2019）。事實上，俄羅斯權力菁英的信仰體系比非菁英更結構化，這意味著他們有比輿論更強的意識形態依附。而且，正是在帝國輝煌時代懷舊的意識形態上，普京得到了俄羅斯權力菁英的最大支持。而這種保守的意識形態在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期間最爲明顯，因爲，普京將這種保守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當作政治工具。

(三) 權力菁英的分裂是普京的反制權力菁英的策略

普京 sistema 的權力菁英不是單一的群體，而是存在著不同類型的分裂。因此，普京運用反制衡策略，通過平衡他們的權力，得到菁英的支持。權力菁英主要的分裂最主要有三種模式：其一爲保守－現代化（conservative-modernisation）分裂，其明顯體現在「保護者」（protectors）[11] 和「法治派」（siliviki）[12] 的對立。「保護者」團體堅持保守主義、鎮壓和侵略，但年輕一代「法治派」支持進步、自由化和對話（Stanovaya, 2020a）。其二爲世代分裂（generational schism），最具體的例子爲梅普時期支持梅德韋傑夫的年輕

---

[11] 從 2014 年以來形成了一種新型菁英「保護者」，大多數是許多在普京政權裡「強力集團」中主張鎮壓的菁英集團領袖與保守意識形態人士之間所形成的非正式聯盟。他們一致認爲，應對俄羅斯的挑戰需要採取更嚴厲、更保守的方法。

[12] 「法治派」人士，通常是年輕的科技官僚（younger technocrats），係指與強力集團相對峙的年輕科技官僚，大多具有高學歷，並擁有高度專業知識，希望帶領俄羅斯朝向現代化國家邁進（連弘宜，2016：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科技官僚，和支持普京的年長及傳統蘇聯教育下的世代間的緊張（Viktorov, 2014）。其三爲位置－聲譽（position-reputation）分裂，有些權力菁英單單是因爲他們在政府中的高階職位而獲得政治影響力，但是有些菁英是由於他們與普京的關係，而在官方角色外具有政治影響力（Gorenburg, 2020）。前者的影響力是比較多變的，因爲是地位給予他們權力，這意味著一旦他們失去了地位，他們的影響力就會自動減弱。後者大多由「強力集團」（siloviki）組成，無論他們佔據什麼位置，都擁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三種分裂模式在 2018 年選舉過後，更爲激烈，從外部看，由這些菁英組成的政權看起來穩定而強大。然而，如果我們從內部來看，菁英間的分裂危機正在腐蝕俄羅斯的政局（Greene, 2019）。

肆、普京 sistema 權力菁英之結構與發展分析

普京在 2000 年初任總統時期的第一階段，圍繞在普京身邊主要是葉爾欽的「家族」、高層菁英的殘餘勢力和普京的聖彼得堡菁英團體間的權力鬥爭。這場鬥爭暴露了新總統團隊內部越來越明顯的裂痕。隨著葉爾欽殘餘勢力的消退，普京的聖彼得堡菁英團體也開始分裂，「強力集團」開始強勢地擴張權力，試圖控制資源，於是普京的朋友和安全部門的前同事（內圈）之間反復發生摩擦和對立，衝突不斷。[13] 在普京政權時期，權力菁英的最大轉變發生在 2007 年至 2008 年之間，2004 年和 2012 年總統選舉前後的轉變較小，2020 年普京撤換總理、公投修憲也引起了一波菁英變動。

因此，在探討普京 sistema 權力菁英之變動與發展時，作者首先以先前建構的菁英團體的網絡類型矩陣，來分析普京 sistema 下的菁英團體結構，然後審視 1991 年至今，俄羅斯的權力菁英團體的發展與變化歷程，並輔以俄羅斯《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eta,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0 年間（1999～2019）對俄羅斯的最有影響的百大政治人物之排名，[14] 可用於探討普京

[13] 例如，Rosneft 與 Gazprom 的鬥爭、Rosneft 與 Transneft 的內鬨等。

[14] 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eta,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會每月會對俄羅斯的最有影響的百大政治人物進行排名，並會在每年的 1 月，發布前年度的總排名。俄羅斯的《獨立報》在每年每月會使用封閉式問卷，向 24～27 名俄羅斯政治學

臺灣人文社會研究期刊資料庫

統治 20 年期間俄羅斯菁英中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成員，最後試著就 2020 年時更換總理和修憲公投後的菁英變動對菁英團體未來發展做一分析。

一、俄羅斯菁英團體的結構分析

對於普京的菁英團體結構，總體可歸類爲以普京政權下的權力菁英的分類的「克里姆林宮塔樓」（“Kremlin towers”）[15]、著重於菁英管理模式的「政治局 2.0」（“Politburo 2.0”）[16] 或說明與普京權力距離的「行星」（“Planets”）[17] 的模型（Липман & Петров, 2012: 28-30）。但是，本文想強調網絡來分析普京的菁英結構與發展，因此以圖 2 的菁英團體的網絡類型矩陣分析普京 sistema 下的菁英團體（圖 3）。以強連帶與弱連帶、私領域與公領域、個人與制度間的網絡，網絡彼此交錯又在 sistema 的運作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尤其是在公私領域界限模糊，身居高位的個人與其網絡連帶的菁英團體間的關係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例如，老朋友或強連帶的有用的朋友一旦被任命至值得信賴的職位，就會晉升至內圈，又或者弱連帶核心

家、政治戰略家、媒體專家、政黨代表進行專家問卷調查並統計結果（專家名單會列於報導結尾）。每個月，會向專家們提問以下問題:「您如何評價下列俄羅斯政治家在俄羅斯聯邦總統、俄羅斯聯邦政府、俄羅斯聯邦議會在行政管理中的影響？（從 1～10 的評分等級）？」每月專家都會對問卷中的政治人物評分，也可提出未列於名單中的政治人物，如果有多於兩位專家提出了未列於名單上的人物，而這人物將會出現在下月待評分的政治人物名單中。在年度政治人物匯總表中，匯總了專家認爲至少有 6 個月進入前 100 名的所有政治家的平均得分排名（Gorenburg, 2020；Орлов, 2021a）。而本文則擷取 1999～2019 年的資料並參考 D. Gorenburg (2020) 基於同樣資料的分析文獻，從這些資料可用於分析普京統治 20 年期間俄羅斯菁英中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成員，並挑選每時期較有影響力及之後有延續影響（至少有延續影響 10 年以上）或影響力延續至今的重要權力菁英進行分析，符合的菁英大約爲 4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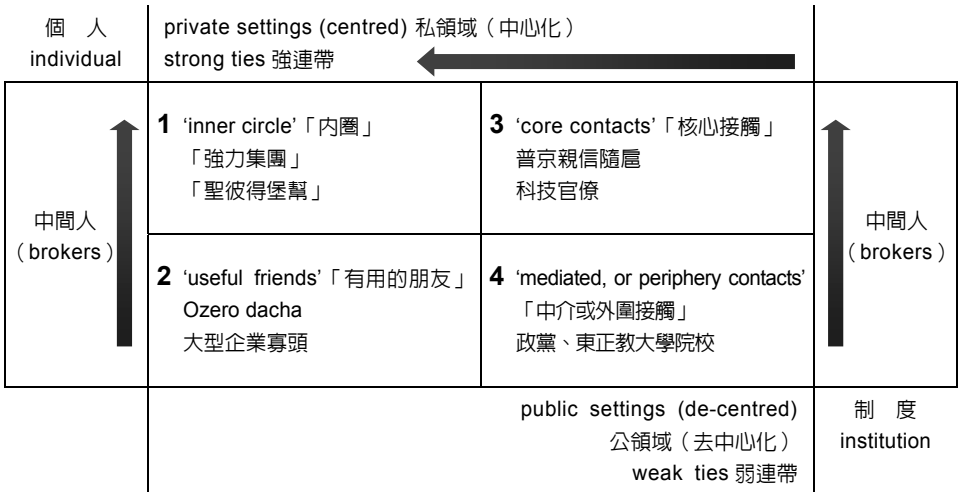
15 普里必洛夫斯基（В. Прибыловский）提出的「克里姆林宮塔樓模型」這不僅是以克里姆林宮建築對菁英團體的譬喻譬喻，而且是對瀰漫該政權的內部競爭的評論。他以一個權力圈中區分了九個基本權力集團。其中至少有兩個與來自聖彼得堡的安全部門有關。

16 「明欽科分析公司」（The Minchenko analytical company）長期以來一直使用「政治局 2.0」的比喻來分析菁英管理和追蹤菁英階層的變化。

17 貢特馬黑爾（Евгений Гонтмахер）提出的「行星」模型將普京描述爲被三個行星圈包圍的太陽。每個「行星」都有自己的「軌道」（經濟或社會部門）、「衛星」（行星的基本網絡）和「人口」（他們的幸福取決於他們的行星站在向陽的一面）。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圖 3　普京 sistema 的菁英網絡矩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接觸的科技官僚因被普京信任而逐漸取代原有的內圈。網絡中的這種位置變化是基於連帶的強度和環境變化的動態發展，也就是私人網絡可能導致任命和正式從屬關係，或者相反，正式從屬關係可能導致私人網絡持續時間超過正式從屬關係，或正式從屬關係已然結束，卻由私人網絡延續權力。這些變化不太可能在模型矩陣中反映出來，但可以通過對網絡的長期觀察來追蹤。

(一) 中心化網絡與個人－內圈

內圈包括每天或定期聯繫的關係者，在普京 sistema 可以認定爲普京的核心圈，包含密友、可以直接和普京聯繫，以及可以被邀請至私人聚會（如生日會）的緊密關係者。一般而言，普京強連帶的內圈包含兩個菁英集團：聖彼得堡「強力集團」和「聖彼得堡幫」。這兩個集團成員是由普京在 1990 年前後，擔任國家安全部門或曾任聖彼得堡副市長期間遇到的同事所組成。20 年後，仍然是普京的核心菁英，並主宰著俄羅斯的政治路線和國營大企業（Monaghan, 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強力集團」

菁英團體中，最強大、最複雜也是最多派系的就是「強力集團」，主要的成員大多出身自軍工複合體或安全部門，如謝欽（Igor Sechin）、帕儲雪夫（Nikolai Patrushev）、博爾特尼科夫（Aleksandr Bortnikov）、伊凡諾夫（Sergei Ivanov）和巴斯特里金（Aleksandr Bastrykin）等，但是比起不同的菁英團體之間，強力集團成員之間的衝突最爲明顯，如聖彼得堡的兩個主要「強力集團」，謝欽陣營和伊凡諾夫－帕儲雪夫（Ivanov-Patrushev）陣營之間始終存在緊張關係。但是將「強力集團」集結的是一套核心價值觀和共同的政策偏好：「強力集團」相信國家是社會的基礎，因此必須增強社會各個領域的國家權力——尤其是在經濟、安全領域和國防部門。在意識形態方面，「強力集團」遵循「國家主權主義」（statism），將愛國主義、反西方主義、仇外心理、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威權主義和經濟手段聯繫在一起（Staun, 2007）。

2014 年以後，隨著克里姆林宮的態度變得越來越保守，從「強力集團」中分裂出一個關鍵團體－「保護者」，[18] 因主張保護國家體系免受國內外敵人的侵害，變得日益強大。他們彼此分享強硬的意識形態觀點和對政治反對派使用鎮壓的訴求。「保護者」的意識形態毫無顧忌地借鑒了陰謀論，試圖動員社會對抗外國威脅，並主張對俄羅斯人的私人和政治生活進行更嚴格的控制。成員包含安全理會會秘書帕儲雪夫、調查委員會主席巴斯特里金，以及外國情報局局長納雷甚金（Sergey Naryshkin）等（Stanovaya, 2020b: 8）。

2.「聖彼得堡幫」

「聖彼得堡幫」大致是用來稱呼除了聖彼得堡「強力集團」外的聖彼得堡菁英團體。如律師、物理學家、柔道夥伴等。他們同強力集團一樣效忠於普京，但他們一般沒有軍警的出身。他們是普京所建構的的第二大權力派系，也是普京用來平衡、制約強力集團勢力的主要力量，「聖彼得堡幫」

[18] 「保護者」雖然出自「強力集團」，並非所有「保護者」都是「強力集團」，也並非所有「強力集團」都是「保護者」（Stanovaya, 2020b: 8）。

臺灣大學政治期刊資料庫

菁英團體透由專業領域和政府內的政務管理贏得了普京的個人信任。該菁英團體包括梅德韋傑夫、庫德林（Alexei Kudrin）、格雷夫（German Gref）以及科扎克（Dmitry Kozak）等，他們雖然輪調了各種高層職位，但是都可以近距離接觸總統。

(二) 強連帶和私領域相關－「有用的朋友」

鑑於許多帶著恩惠（favors）的友誼是都是經由中間人牽引而形成「有用的朋友」，而這樣的強連帶，通常帶著利益的交換和政商關係。此網絡包含 Ozero dacha 合作社（Ozero dacha Cooperative）[19] 和大型企業寡頭。

普京和科瓦爾丘克（Yuri Kovalchuk）、雅庫寧（Vladimir Yakunin）及其他 5 位朋友於 1990 年代初在聖彼得堡成立了 Ozero dacha 合作社（Dawisha, 2015: 94-96），這些人因爲和普京的關係，後來在普京第二任期時和「強力集團」密切聯繫，彼此互惠。

大型企業寡頭包含共同擁有俄羅斯最大的天然氣管道和電力供應線建築公司 Stroygazmontazh 集團的羅騰伯格兄弟（Arkady Rotenberg & Boris Rotenberg），國有技術公司 Rostec 的負責人切梅佐夫（Sergei Chemezov）和國有石油運輸公司 Transneft 的總裁托卡列夫（Nikolay Tokarev）都是普京在東德時的朋友或同事（Stanovaya, 2020b）。國家主權主義者需要寡頭來創造財富，而寡頭需要國家提供政治穩定和保護。

(三) 弱連帶和公領域相關－「核心接觸」

領導人需要專業科技官僚才能執行他們的政策，在制度中的弱連帶網絡便是政策的實際運作者，也是在制度中與普京的「核心接觸」者，包含普京的親信隨扈（Putin's retinue）和科技官僚（technocrats）。

親信隨扈是普京行政團隊的核心。總統親信隨扈的職能相當狹窄：制定總統的日程安排並處理禮賓職能、準備和安排普京的會議。例如：總統府辦公廳主任瓦伊諾（Anton Vaino），以及克里姆林宮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19] Ozero dacha 合作社成立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及俄羅斯銀行的所有者，美國財政部將其描述爲俄羅斯高級領導層的私人銀行，其中包括普京本人（Stanovaya, 2020b: 6）。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Dmitry Peskov）等。親信隨扈滿足總統在工作及相關的需求，以及向普京提供符合他現有世界觀的重點訊息，維持他的工作情緒，報喜不報憂（Stanovaya, 2020b: 3）。

科技官僚爲普京在幾個關鍵領域制定政策。總理米舒斯金負責促進俄羅斯的經濟成長，俄羅斯總統府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Sergey Kiriyenko）負責監督國內和地區政策。格洛莫夫（Aleksei Gromov）負責傳統媒體。第一副總理別洛烏索夫（Andrei Belousov）領導經濟決策過程。財政部長西盧阿諾夫（Anton Siluanov）負責財政政策和預算，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y Shoigu）負責執行有關外交和軍事政策的決定，中央銀行行長納比烏琳娜（Elvira Nabiullina）和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Sergei Sobianin）也屬於這一團體。所有這些科技官僚都是普京很難找到可以取代的傑出人物（Stanovaya, 2020b: 7）。

(四) 去中心化網絡與制度－中介或外圍接觸

通過弱連帶和制度，在普京 sistema 做中介或外圍接觸的網絡爲政黨、東正教與大學院校。這三者都是制度與社會重要的組成，隸屬於普京的權力黨（統一俄羅斯黨）、或大學院校教育、宗教都有助於促進弱連帶，並確保任命優先權、財產收購、國家對商業企業的支持、工作以及協助執法機構解決問題。中介與外圍接觸受益於權力網絡的層級與從屬關係，並有助於維持對不成文規則的依賴和遵守。

觀察俄羅斯菁英的出身，可以看出俄羅斯權力菁英與三所最負盛名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連帶：莫斯科國立大學、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MGIMO）和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學校畢業生中最負盛名的職位是與稅務和海關機構相關的職位以及國家事務官職位。

俄羅斯東正教在普京第三任期時開始正式合作，東正教逐漸在權力菁英內部建立了影響網絡。政黨有系統地諮詢俄羅斯東正教，邀請教會代表參加國家儀式，用國有企業的資金翻新聖地等等。這使得俄羅斯東正教能夠帶頭並在菁英團體中傳播其價值觀（Hudson, 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1991 年以來俄羅斯權力菁英團體的發展與重要權力菁英分析

探討普京的權力菁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葉爾欽時代，1991 年俄羅斯獨立後，是由領導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集團（Gazprom group，之後簡稱 Gazprom 集團）的創始人以及 1992 年至 1998 年的俄羅斯總理車爾諾梅爾丁（Viktor Chernomyrdin），和當時的董事長維亞基列夫（Rem Vyakhirev）所組成的主要的寡頭集團。當時的 Gazprom 集團發揮了最大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但同時期也有其他幾個重要集團，最著名的是丘拜斯（Anatolii Chubais）[20] 的聖彼得堡集團（Petersburg group，由 1991～1992 年政府自由派改革派的剩餘人員組成）；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Yury Luzhkov）爲首的市長團體，其中也包含尤科斯（Yukos）石油公司的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以及「家族」成員包含寡頭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沃洛申（Aleksandr Voloshin），尤馬舍夫（Valentin Yusmashev），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和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21] 之間的聯盟。1996 年總統大選後，「家族」扳倒了 Gazprom 集團並掌握了權力。

1999 年普京擔任總理，2000 年擔任總統，他的繼任要歸功於別列佐夫斯基和丘拜斯聯合集團，在與敵對的盧日科夫和普里馬科夫集團中的勝利。

根據俄羅斯《獨立報》20 年間（1999～2019）對俄羅斯的最有影響的百大政治人物之排名，葉爾欽時代的菁英存續者（Yeltsin-Era Survivors）中，有一些是主要是商業界的寡頭，其中包括阿布拉莫維奇、阿列克佩羅夫（Vagit Alekperov）[22] 和波塔寧（Vladimir Potanin）[23] 及丘拜斯。波塔寧以

---

[20] 丘拜斯是俄羅斯商業寡頭，在 1990 年代初期作爲葉爾欽政府的有影響力的成員負責俄羅斯的私有化，1998 年至 2008 年，他領導國有電力壟斷企業 RAO UES，之後擔任 Rosnanotech 國有企業的負責人。

[21]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開始進行私有化，通過別列佐夫斯基，阿布拉莫維奇結識葉爾欽「家族」。此後他又相繼控股了俄羅斯鋁業公司、俄羅斯民用航空公司等，自 1992 年起，已建立起自己的龐大產業帝國，成爲 1990 年代末俄羅斯的產業寡頭之一。隨著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西方國家和俄羅斯關係惡化，阿布拉莫維奇也受到波及。2018 年 1 月 30 日，美國將 114 名包括阿布拉莫維奇在內的俄羅斯政治活動家和官員列入與俄羅斯領導層接近的「克里姆林宮名單」（Sputnik International, 2018）。

[22] 阿列克佩羅夫是俄羅斯大型石油公司 LUKOIL 的總裁。爲人低調，善於和普京政權建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能夠應對俄羅斯政治格局變化並保持影響力而聞名）。但是自 2014 年後，這四個人因爲偏向與西方保持關係，其影響力已然快速下降。

在高層政治菁英部分，於 1998 年葉爾欽時期曾任總理，現任俄羅斯總統府辦公廳第一副主任的基里延科，和 1991 年至 2012 年曾任緊急情況部（Ministry of Emergency Situations）部長、2012 年起擔任俄羅斯國防部長的紹伊古，此兩人的影響力在 20 年間雖略有起伏，最近幾年則維持在影響力的前 10 名內。

但是，與前兩位權力菁英相比，朱可夫（Aleksandr Zhukov）曾在政府中擔任過多種職位，包括作爲國家杜馬第一副主席、組織索契冬奧會的俄羅斯奧委會主席以及副總理，他的影響力近年來急劇下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沃洛申（Aleksandr Voloshin）在普京的第一任總統任期內，曾任總統辦公廳主任（Chief of Staff of th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被認爲是俄羅斯最有權勢的人之一。但是他自 2003 年辭職以來，儘管職位相對較低，卻也一直保持在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俄羅斯人名單上（Gorenburg, 2020）。

(一) 普京政權初期（2000～2007）：原始權力菁英的奠基

普京任職後的前 3～5 年，主要是與兩個主要菁英團體共享權力：與總統一起進駐莫斯科的聖彼得堡「強力集團」，以及從葉爾欽繼承的「家族」。聖彼得堡「強力集團」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最初包括伊凡諾夫，帕儲雪夫和謝欽。聖彼得堡「強力集團」在當時也和其他聖彼得堡菁英團體，如其中包括科扎克和梅德韋傑夫的律師團體，及其他幾個團體結盟。從 2003 年至 2004 年，不斷壯大的聖彼得堡集團，特別是「強力集團」，開始分裂出規模較小的派系，且常常彼此鬥爭。第一個分裂的菁英是伊凡諾夫，他明

立良好關係，並致力於社會慈善，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LUKOIL 石油公司在俄羅斯 22 個地區捐贈了超過 6.52 億盧布，並在其前蘇聯地區國家捐贈了近 90 萬美元（Neftegaz.ru, 2020）。

23 波塔寧是俄羅斯商業寡頭，政商手腕靈活，根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他是俄羅斯最富有的人，也是世界第 42 位最富有的人（Bloomberg, 2021）。2018 年 1 月，波塔寧出現在美國財政部的「普京名單」（Putin's List）中，該名單中有 210 名與普京關係密切的人（CNN, 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擺著「繼承人」的自稱使謝欽感到不快。2005 年因爲謝欽阻止科扎克被任命爲總檢察長，而是任命了烏斯季諾夫（Vladimir Ustinov），[24] 包括帕儲雪夫在內的其他幾位菁英與謝欽衝突，也因此謝欽與梅德韋傑夫和科扎克的關係也陷入僵局。此外，「強力集團」中，雅庫寧所領導的一小群與俄羅斯東正教親近的菁英也自「強力集團」分裂，因爲他們希望避免與謝欽或帕儲雪夫公開衝突。

「家族」也因爲其成員對普京的忠誠度（或缺乏忠誠度）而分裂，金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被迫流亡英國，[25] 而他的前附庸沃洛申和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宣誓效忠普京，並分別擔任總統辦公廳主任和總理職位。同時，德里帕斯卡保留並擴大了對鋁業的控制權，而阿布拉莫維奇則繼續從事石油行業。盧日科夫集團維持其對莫斯科的主控權，但是，與此同時，由於失去霍多爾科夫斯基，市長集團中在經濟上明顯削弱。[26]

根據俄羅斯《獨立報》20 年間（1999～2019）對俄羅斯的最有影響的百大政治人物之排名，普京的原始菁英團隊，也就是「內圈」之「強力集團」和「聖彼得堡幫」，20 年來一直是俄羅斯政治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該團隊的大多數人都與普京有強連帶關係，「強力集團」是通過安全部門的連帶，「聖彼得堡幫」是普京在 1990 年代在聖彼得堡市長辦公室的同事與朋友網絡。

聖彼得堡「強力集團」謝欽、帕儲雪夫和伊凡諾夫在普京執政期間一直是核心圈子的核心成員。這三個人的特點是無論他們在政府中擔任何種職位，影響力持續高且不變，例如：謝欽曾擔任過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副總理（普京擔任總理），和俄羅斯國營石油公司 Rosneft 的負責人。2012 年卸任政府職務後，他的影響力並未減弱，時至今日，他仍是俄羅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帕儲雪夫作爲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局長和安

24　烏斯季諾夫的兒子已與謝欽的女兒結婚。

25　在葉爾欽時代，別列佐夫斯基是俄羅斯的「七大寡頭」之一，在金融、能源等領域累積了巨額財富，並在政壇呼風喚雨。他下場是因爲他說了「一個電視頻道讓猴子當選總統」的笑話，這不僅使他的電視台「第一頻道」（Channel One, Первый канал）被收掉，也讓他流亡英國，於 2013 年死於英國，死因不明。

26　2010 年，盧日科夫被免去莫斯科市長一職後，迅速失去了影響力。

臺灣人文社會研究期刊資料庫

全理事會秘書都具有很高的影響力，儘管後者的正式權力相對有限。伊凡諾夫首先擔任國防部長，然後擔任副總理，最後擔任總統辦公廳主任，雖然他於 2016 年離開總統府的位子，他的影響力已經減弱，但儘管在俄羅斯政治中幾乎沒有重要的官方職位，但他仍然在名單上的事實說明了他與普京的強連帶。

聖彼得堡幫（包含律師、經濟學家和普京的朋友）：梅德韋傑夫、庫德林、[27] 格雷夫、[28] 科札克和格里茲洛夫（Boris Gryzlov）。[29] 梅德韋傑夫先後擔任過總統辦公廳副主任、Gazprom 董事會主席、第一副總理、總統和總理，自 2020 年離開總理職位後，轉任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deputy chairma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影響力稍減。科札克是普京的親密盟友，1990 年代曾與普京一起在聖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曾擔任過許多重要職位，現任爲總統府辦公廳副主任。此時期，金融部門開始集中在聖彼得堡經濟學家庫德林和格雷夫手中。

在普京的原始菁英團隊中，有 3 人是屬於普京的弱連帶，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30]、格洛莫夫和德里帕斯卡。蘇爾科夫在葉爾欽時期是沃洛申的下屬，2000 年後逐漸成爲普京政權的重要人物和普京政權意識形態的設計師。格洛莫夫則是自始就是莫斯科的行政官僚，在普京領導下，職位逐步上升，現任總統府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影響力也逐步上升。德里帕斯卡是這個菁英團體中的一個異類，因爲他的角色是在企業而不是政府中。儘管與出現在其他團體中的一些商人相比，他與普京的聯繫更緊密，

---

27 庫德林於 2000～2011 年曾任財政部長，設立穩定基金，自 2018 年起由普京提名擔任俄羅斯聯邦會計院主席（Chairman of the Accounts Chamber，俄羅斯聯邦的議會金融監管機構）。

28 格雷夫從 2000 年 5 月至 2007 年 9 月曾任經濟和貿易部長，自 2007 年起至今，擔任 Sberbank 的 CEO 和執行董事。

29 格里茲洛夫曾任前國家杜馬主席（2003～2011），俄最大黨統一俄羅斯黨前任黨主席（2004～2008）。

30 蘇爾科夫被認爲是克里姆林宮的主要思想家及意識形態掌控者，同時對總統競選工作有重要貢獻。蘇爾科夫被視爲俄羅斯現行政治體系的主要設計者，該體系通常被描述爲「可控」民主或「主權」民主。2011 年 12 月至 2013 年 5 月曾任俄羅斯副總理，2013 年辭職後，回到總統辦公廳，成爲總統的私人助理。2020 年 2 月離職，2020 年的百人影響力名單中，已不見他的名字（Орлов, 2021a）。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但隨著權力從商界人士轉向政府官員，他的影響力在過去 10 年中有所下降（Gorenburg, 2020）。

此外，有些菁英是在普京的第一任期時才展露頭角，包括米勒（Aleksei Miller）作爲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巨頭 Gazprom 的總裁，自 2003 年以來在任期間一直保持在俄羅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 25 人之列。羅戈津（Dmitry Rogozin）是在普京第一任總統任期時，是祖國黨（Rodina）的黨主席，[31] 是爲數不多的選舉出身的權力菁英之一，因此是當時少數擁有獨立權力基礎的有影響力的政治家。

(二) 普京第二任期結束至梅普共治時期（2007～2012）：第二梯隊權力菁英的出現

2007～2008 年是普京政權時期菁英變動最大的時期，原因有二：一是 2008 年普京面臨著總統任期期滿，繼任總統人選的壓力；二是梅普共治時期，普京雖然擔任總理，但是如何使總理權力能壓制梅德韋傑夫總統，並維持自身對菁英團體的影響力，因此，許多權力菁英（第二梯隊）在 2007 年或 2008 年出現或升至高位，且大部分菁英的影響力一直持續至今，且在此時期的菁英變動有三個特點：一是普京的次要密友開始掌握勢力，二是女性菁英的崛起，三是東正教與普京正式互惠，密切合作。

在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期間，大多數菁英團體和權力網絡重新組成了兩個對立的聯盟，一個忠於梅德韋傑夫，大多爲年輕的「法治派」，主要是由聖彼得堡律師團體、沃洛申菁英團體和繼承自葉爾欽「家族」的德佛克維奇（Arkady Dvorkovich）[32] 和蘇瓦洛夫（Igor Shuvalov）[33] 菁英團體；聖彼得堡經濟學家，和其他一些小網絡所組成。另一個忠於謝欽，主要是三個主

31　祖國黨後來在 2006 年與一些左派小黨合併爲「公正俄羅斯」（A Just Russia）黨，2021 年 1 月與俄羅斯愛國者黨（Patriots of Russia）和眞理黨（For Truth）合併，組成了「正義俄羅斯－愛國者－眞理」黨（A Just Russia — Patriots — For Truth）（The Moscow Times, 2021）。

32　德佛克維奇是梅德韋傑夫密友，於 2008～2012 年擔任梅德韋傑夫總統助理，2012～2018 年間於梅德韋傑夫內閣擔任副總理一職。2018 年卸除政府職務後，影響力驟減。

33　蘇瓦洛夫於 2012 年至 2018 年任梅德韋傑夫內閣第一副總理。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要聖彼得堡「強力集團」的謝欽和伊凡諾夫的菁英團體、雅庫寧的俄羅斯東正教「強力集團」，以及聖彼得堡柔術和物理學家菁英團體所組成。這兩個聯盟之間的主要分歧是總統任期，謝欽和他的人馬支持普京第三任期，而在沃洛申的領導下的另一方則支持梅德韋傑夫連任。在梅德韋傑夫總統任期快要結束時，「梅德韋傑夫」聯盟基本上崩潰了。庫德林公開批評梅德韋傑夫，此舉實際上是在普京控制下進行的。

根據俄羅斯《獨立報》20 年間（1999～2019）對俄羅斯的最有影響的百大政治人物之排名，普京第二任期所加入的菁英中，巴斯特里金、[34] 納雷什金、[35] 博爾特尼科夫、切梅佐夫和科瓦爾丘克與普京關係密切。前三人曾是普京在安全部門的同事，[36] 值得一提的是，納雷什金在 2008～2011 年間，在普京的安排下，納雷什金擔任梅德韋傑夫的總統辦公廳主任，以確保梅德韋傑夫對普京的忠誠（Faulconbridge & Stott, 2008）。而博爾特尼科夫自 2008 年 5 月 12 日起，擔任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局長至今，由此可見，普京對此兩人的信任。切梅佐夫和科瓦爾丘克未在普京政府任官職，但卻因爲是朋友關係而在重要的企業任職高位。切梅佐夫是 Rostec 國營國防工業公司的總裁，科瓦爾丘克被譽爲「普京的私人銀行家」（Vladimir Putin's personal banker）。這 5 人和普京的關係大多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學校教育或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在安全部門工作。這 5 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升至極具影響力的職位，並且在普京之後總統期間一直位居影響力的高位。

拉夫羅夫算是普京第二任期時加入的另類菁英，他本身和普京並無關係，是靠職位晉升而贏得影響力。他自 2004 年起擔任外交部長（之前曾擔任

---

34 巴斯特里金是普京的大學同學。他曾前俄羅斯第一副檢察長，前檢察長辦公室主席，於 2007 年被任命爲總檢察長辦公室內的反腐敗機構調查委員會（Investigative Committee, IC）的負責人。他的影響力在 2011 年進一步增強，當時 IC 成爲直接隸屬於總統的獨立機構。

35 納雷什金自 1980 年代初就和普京認識，一起在列寧格勒的蘇聯安全部門（KGB）學校實習。曾任總理辦公廳主任、副總理、國家杜馬主席，以及 2016 年 9 月，納雷甚金被任命爲俄羅斯對外情報局（SVR）局長。

36 這三人後來都是「保護者」領導人，此任用也可證實普京在第三任期時，態度轉趨保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副外長和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儘管多年來他不是普京的內圈成員，但他能長期在高位也逐漸轉化爲對當局決策的更大影響力（Gorenburg, 2020）。

此外，有兩位突出的女性菁英也在此時崛起：戈利科娃（Tatiana Golikova）和納比烏琳娜（Elvira Nabiullina）。戈利科娃從財政部晉升，在 1990 年代後期曾任財政部副部長、衛生和社會發展部長、會計院主席，於 2018 年成爲主管社會政策的副總理。納比烏琳娜在 2007 年成爲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部長，自 2013 年轉任俄羅斯中央銀行行長以來，一直至 2021 年 12 月影響力已躍升至第 6 位（Орлов, 2021b）。

俄羅斯東正教莫斯科及全俄羅斯牧首（第 16 任）基里爾（Patriarch Kirill）在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等級制度中崛起，1989 年開始擔任教會對外關係部的負責人，2009 年在前牧首阿列克謝二世（Patriarch Alexy II）去世後當選爲牧首，基里爾領導下的教會開始與普京政權密切合作（Gorenburg, 2020）。

現任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Sergei Sobianin）和沃洛金（Viacheslav Volodin）則是從選舉出身，索比亞寧於 2010 年由梅德韋傑夫指派接替盧日科夫成爲莫斯科市長，由於俄羅斯 2012 年 6 月立法恢復了 2004 年被取消的地方行政長官直選制度，索比亞寧於 2013 年成爲立法後第一位民選市長，而他的權力也獨立於普京的菁英網絡，從民眾中建立聲望。沃洛金從 1999 年開始成爲國家杜馬議員，擔任杜馬副議長，2011 年擔任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時，推動普京的第三任期回歸（Economist, 2016），自 2016 年起擔任國家杜馬議長。這兩人皆成功進入普京的「核心接觸」。

(三) 普京回歸總統職位，第三任期後（2012～2019）：權力菁英間接班人之競爭

2012 年俄羅斯總統與總理互換位的鬥爭，謝欽聯盟取得了勝利，菁英團體間開始轉向資源的爭奪：謝欽對上德沃科維奇，Rosneft 總裁和國家副總理之間可見的戰爭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氣的控制上。但是菁英團體間的其他衝突也從 2011 年開始出現，並在 2012 年底開始變得明顯且火熱化。

首先，負責軍工複合體的副總理羅戈津開始嶄露頭角。儘管他不屬於任何行政／經濟族群和集團，但在權力菁英中的相當一部分的重要人士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開始重視，謝欽開始對羅戈津產生戒備。[37] 即使羅戈津與「強力集團」在意識形態上有共識和氏族網絡的強連帶，[38] 他也沒有設法與普京周圍的「強力集團」結盟。羅戈津在 2011 年被任命爲副總理，他在國防工業利益團體，軍隊和警察高層將領、和許多曾看好謝欽的「強力集團」的菁英間是甚受重視。[39]

而另一個菁英團體鬥爭的焦點則是謝爾久科夫事件（The Serdyukov affair）。2007 年，普京任命謝爾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爲俄羅斯聯邦國防部長，主要任務是打擊俄羅斯軍隊的腐敗和低效率，他任內開始著手軍隊改革和企圖解決國防部腐敗問題的嘗試，都得到了總統的普遍支持。由於他強大的連襟強連帶網絡，[40] 包括謝欽及其他有影響力的「有用的朋友」都對他極其寬容。

謝爾久科夫在 2012 年被總理梅德韋傑夫批評其軍隊改革的延誤，他公開提出辭職，但普京不予接受。而這發生在謝爾久科夫因外遇醜聞而與妻子和岳父公開決裂之前。[41] 2012 年 9 月，普京由於身體嚴重不適，[42] 他無法繼續壓制腐敗醜聞並抑制菁英之間的內部鬥爭。最終，反謝爾久科夫運動在媒體的揭露下開始發酵，此舉迫使普京解除了他親信的國防部長的職務，這可能是普京首度屈服於菁英團體的壓力下，免職了一個忠誠度高，但

---

37 實際上，謝欽和羅戈津早期基於他們對西方主義者丘拜斯、庫德林以及對蘇爾科夫的共同敵視的而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因爲羅戈津的崛起，雙方利益重疊，關係早已陷入僵局。

38 羅戈津妻子的父親是退休的 KGB 將軍，但是來自莫斯科，這幾乎可以肯定意味著他支持普里馬科夫。

39 羅戈津由於與其他領導人的衝突，他在離開公正俄羅斯黨後被引進了普京的菁英網絡。對於引進半反對派人物和愛國者羅戈津是誰的想法，目前仍不明確，但是肯定不是謝欽，有一說是是伊凡諾夫。

40 謝爾久科夫的岳父是祖布科夫（Viktor Zubkov），把他扶上國防部長的職位。祖布科夫曾爲前總理，之後擔任副總理，自 2008 年起擔任 Gazprom 董事會主席。

41 謝爾久科夫與國防部採購辦公室主任瓦西里耶娃（Yevgenia Vasilyeva）發生婚外情，並與其同居。他的元配家庭對此極爲不滿。之後他的元配波赫萊貝尼娜（Yulia Pokhlebenina）訴請離婚。而他的岳父向他的同夥明確表示，他不再認他爲女婿，撤銷所有對他的支持與庇蔭。

42 普京在當時因爲接受體能訓練時背部受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犯錯的「圈內人」。[43] 之後，科技官僚紹伊古接任國防部長（Weiss, 2013）。

羅戈津的崛起和謝爾久科夫事件後，權力菁英團體開始重組。由於對謝爾久科夫的共同敵對情緒，羅戈津和伊凡諾夫之間發展成一個穩定的聯盟，之後其共同的目標是反對總理梅德韋傑夫、副總理德沃科維奇和蘇爾科夫。原因有二：其一，德沃科維奇與伊凡諾夫之間的衝突已使電信巨頭 Rostelekom 的 2014 年私有化計劃陷入僵局。[44] 最後，德沃科維奇支持的烏斯曼諾夫（Alisher Usmanov）勝出，Rostelekom 新總裁是隸屬於烏斯曼諾夫的陣營的卡路金（Sergei Kalugin）。其二，伊凡諾夫在 2014 年索契（sochi）冬季奧運會的籌備上擊敗了德沃科維奇。[45]

謝爾久科夫倒台事件，引起兩個效應：普京對現有的權力菁英網絡的操控力減少的疑慮，和未來總統接班人之爭。

此時期，俄羅斯的主要政治鬥爭，一邊是由沃洛申和德沃科維奇領導的親梅德韋傑夫陣營，另一邊是伊凡諾夫和羅戈津領導的新的反梅德韋傑夫聯盟，他們計畫將梅德韋傑夫撤除總理職位（同時可能爲繼承者角色）。

謝欽的舊反梅德韋傑夫聯盟，其立場基本保持不變，但並未將梅德韋傑夫視爲主要敵人。[46] 謝欽陣營主要是反對任何背離自己已習慣的國家資本主義原則的行爲，反對庫德林式和／或德沃科維奇式的自由主義改革，或任何漸進式的政權自由化。

43　但是，普京卻阻止了謝爾久科夫的敵人把他放進監獄，普京基於提供恩庇主保護的立場，謝爾久科夫可能曾經不檢點，但他是一個忠誠的圈內人。

44　Rostelekom 的主要競爭者是總統顧問及前通訊部長謝戈列夫（Igor Shchegolev）和他的「錢袋」（謝戈列夫孩子的教父），俄羅斯東正教企業家馬洛夫耶夫（Konstantin Malofeyev），他是 Rostelekom 的最大非官股的股東（他在謝戈列夫擔任通訊部長期間以極其便宜的價格購得股份），而在另一位則是烏斯曼諾夫。伊凡諾夫支持謝戈列夫和馬洛夫耶夫，而德沃科維奇和現任通訊部長尼基法洛夫（Nikolai Nikiforov）則支持烏斯曼諾夫。

45　2013 年 2 月，他成功地讓普京總統對參議員比拉洛夫（Akhmed Bilalov，他是德沃科維奇的人馬）產生反感。結果，比拉洛夫丟掉了國有的北高加索度假村（KSK）奧委會副主席兼董事會主席的職位。

46　謝欽基本上不曾是梅德韋傑夫的好友，但他也並未參與將梅德韋傑夫從總理辦公室免職（2020 年 1 月 15 日梅德韋傑夫宣布辭職）的鬥爭，顯然是因爲謝欽擔心梅德韋傑夫的繼任者極可能不會是紹伊古，祖布科夫或索比亞寧，而是伊凡諾夫，謝欽對伊凡諾夫的權力雄心抱有戒心，因此對伊凡諾夫的盟友羅戈津也加以防範。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在外交政策方面，謝欽陣營主張與中國結盟來對抗西方。雅庫寧的俄羅斯東正教徒「強力集團」雖然也反對西方，卻並不認爲中國是反西方俄羅斯的最好朋友，而是更喜歡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這與羅戈津有共同點。另一方面，儘管聖彼得堡物理學家團體與雅庫寧有聯合過，他們還是傾向於爲謝欽團隊效力，他們並不在乎東正教，對阿拉伯世界並不特別同情，也沒有敵意向西。但是，只要謝欽對普京保持自己的影響力，彼得堡物理學家團體就不希望分裂並放棄謝欽（Taylor, 2017: 57-60）。

此外，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因爲逐漸在人民中贏得支持，開始在莫斯科形成一個新菁英團體，而他們也盡量避免與謝欽，伊凡諾夫以及梅德韋傑夫發生爭執。

根據俄羅斯《獨立報》20 年間（1999～2019）對俄羅斯的最有影響的百大政治人物之排名，普京在順利回歸第三任總統職位後，政策開始趨於保守，除了菁英團體間的鬥爭愈來愈白熱化外，菁英網絡愈加封閉，因此，2012 年後，能進入名單的新菁英明顯減少。但有三位菁英極可能在未來有更高的影響力：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自 2012 年以來一直擔任普京的新聞秘書、西盧阿諾夫（Anton Siluanov）於 2011 年任財政部長，曾於 2018～2020 年兼任第一副總理、瓦伊諾（Anton Vaino）於 2016 年直接被任命爲總辦公廳主任（Gorenburg, 2020）。這三人的重用，也顯示出普京知道舊有的權力菁英團體已發展出自己的網絡，未來不太能受普京操控，普京開始傾向弱連帶的「核心接觸」，這些人依賴普京所給予的職位，對普京的忠誠度極高。

(四) 2020 年的修憲與菁英的變動

2020 年 1 月梅德韋傑夫辭去總理職位，7 月 1 日通過全民公投修憲。[47] 普京總統巧妙地取消了俄羅斯憲法對總統任期限制的規定。然而，通過修改憲法和改組政府，此舉也具體顯示了普京的 sistema 正在面臨危機：以往圍繞著普京的權力菁英團體，因爲長期擁有權力，已然建立了能脫離並獨立於普京控制下的菁英網絡，能以自己的名義去拓展勢力（Stanovaya,

[47] 該公投原定於 4 月舉行，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而推遲。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2020b）。因此，從 2020 年更換新總理後，可以發現自 2000 年代初以來一直與普京並肩作戰的老朋友和同事逐漸被更年輕、更科技官僚的人員所取代。

2020 年 7 月的公投涉及一些重大的憲法修正案，該修正案允許普京實現雙重目標：將他之前的總統任期歸零，可以再競選兩屆（再延長 12 年，直到 2036 年），並同時限制總統的權力（Gould-Davies, 2020）。普京的憲法修正案可以看做普京試圖爲他在 2024 年總統任期的過渡做好計劃，並通過降低總統的重要性來減少對普京將選擇誰作爲繼任者的關注，原因有三：其一，修憲後的總統職位不會擁有普京目前的權力。因此，任命他的繼任者不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Roth, 2020）。其二，其中一項修正案旨在加強議會的權力和總理的作用。其三，新憲法草案賦予前總統及其家屬豁免權，前總統將成爲聯邦院（俄羅斯聯邦議會上院）的終身成員（Russell, 2020）。因此，通過修改憲法來鞏固其豁免權的努力可以被視爲普京開始計劃卸職的準備（Meyer et al., 2020）。

2020 年後，可以發現權力菁英的更新速度明顯加快，這主要是因爲 2020 年 1 月新政府的組建。但是根據 2021 年 1 月俄羅斯《獨立報》所公布的 2020 年最具影響力的百大政治人物排名（見表 1），新出現在名單的菁英，除了現任總理米舒斯金（第 2 名）和格里戈連科（Dmitry Grigorenko，第 46 名）[48] 外，其餘皆在 50 名以外，也就是說目前新加入的菁英仍在「大外圍」更新，這也顯示出 2020 年俄羅斯政治人物影響力的主要特徵如下：(1) 政府菁英核心顯著更新；(2) 與總統有持續穩定接觸的人物影響力仍是最顯著的；(3) 弱連帶「核心接觸」的菁英影響力明顯提升（見表 1 的灰色列）。

總理米舒斯金（第 2 名）的影響力雖高，其內閣雖引進許多新菁英，但多爲科技官僚，靠著職位而獲得影響力（新菁英多在 50 名以外），所以菁英網絡根基甚淺，因此新政府權力的穩定仍須依賴普京的保護。值得注意的是，國防部長紹伊古是核心接觸的科技官僚，出現時期卻是屬於葉爾欽時期存續者，在普京政權期間持續維持著高影響力，實力不容小覷。

[48] 格里戈連科於2020年1月擔任俄羅斯聯邦副總理和政府辦公廳主任。稅務與金融專業。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2020 年俄羅斯的最有影響的百大政治人物排名：前 20 名

政治人物	排名	職位	菁英網絡矩陣類型	出現時期
普京 (Vladimir Putin)	1	總統	–	–
米舒斯金 (Mikhail Mishustin)	2	總理	核心接觸	2020 年後
瓦伊諾 (Anton Vaino)	3	總統府辦公廳主任	核心接觸	第三任期後（2016）
紹伊古 (Sergei Shoigu)	4	國防部長	核心接觸	葉爾欽時期續存者
梅德韋傑夫 (Dmitry Medvedev)	5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 第 4 任統一俄羅斯黨主席	聖彼得堡幫	普京政權初期（原始菁英）
謝欽 (Igor Sechin)	6	Rosneft CEO	強力集團	普京政權初期（原始菁英）
基里延科 (Sergei Kirienko)	7	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	核心接觸	葉爾欽時期續存者
索比亞寧 (Sergei Sobyanin)	8	莫斯科市長	核心接觸	普京第二任期
拉夫羅夫 (Sergei Lavrov)	9	外交部長	核心接觸	普京第二任期
西盧阿諾夫 (Anton Siluanov)	10	財政部長	核心接觸	普京第三任期
納比烏琳娜 (Elvira Nabiullina)	11	中央銀行總裁	核心接觸	普京第二任期
沃洛金 (Viacheslav Volodin)	12	國家杜馬議長	核心接觸	普京第二任期
別洛烏索夫 (Andrei Belousov)	13	第一副總理	核心接觸	普京第三任期
博爾特尼科夫 (Alexander Bortnikov)	14	FSB 聯邦安全局局長	強力集團（保護者）	普京第二任期
巴斯特里金 (Alexander Bastrykin)	15	調查委員會主席	強力集團（保護者）	普京第二任期
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16	總統府新聞秘書、發言人	核心接觸	普京第三任期
帕儲雪夫 (Nikolai Patrushev)	17	安全理事會秘書	強力集團	普京政權初期（原始菁英）
科瓦爾丘克 (Yuri Kovalchuk)	18	Rossiya Bank 總裁	有用的朋友	普京政權初期（原始菁英）
格雷夫 (German Gref)	19	Sberbank CEO 和執行董事	聖彼得堡幫	普京政權初期（原始菁英）
切梅佐夫 (Sergei Chemezov)	20	Rostec 總裁	有用的朋友	普京第二任期

註：灰色列為普京自第三任期後漸漸倚重之弱連帶「核心接觸」菁英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Орлов (2021a) 資料自行整理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名單上前五名的構成產生顯著變化。2020 年底，普京、米舒斯金、總統府辦公廳主任瓦伊諾、國防部長紹伊古、安全理事會副主席兼統一俄羅斯黨領袖梅德韋傑夫按排名順序爲影響力前五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效對抗新冠疫情的情況下，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的影響力顯著增強（第 8 位）[49]（Орлов, 2021a）。

五、結論

T. H. Rigby (1990) 在《蘇聯的政治菁英》（*Political Elites in the USSR*）一書中，以「職官名錄」爲中心來分析蘇聯時期的「恩庇侍從主義」（patron-client）。除了從職官名錄與共黨的組織來分析蘇聯領導人的統治方式外，G. Easter 從蘇聯國家體制建立的角度來分析，提出蘇聯在 1917 年 10 月革命後所建立的極權國家體制是經由私人關係網絡所形成的，而不是過去一般理論所認爲的是經由組織與制度所建立而成的。整個蘇聯國家的體制是在經歷將近 20 年的時間過程中逐漸形成而趨於完備的（2007）。

從俄羅斯特有的網絡 blat 和權力網絡 sistema 的角度來看，可以歸結俄羅斯政治文化具有以下的連續特質：

1. 把個人當做某個較大系統的一部分（例如，「自己人」的圈子或者利益關係網）而不是彼此孤立或只爲自我考慮。
2. 鼓勵個人尋求保護並償還得到的恩惠（favors）。
3. 保持、培養長期的關係，進而建構彼此間的相互依賴，而不追求短期、短視的行爲。
4. 依據靈活的檯面下準則來進行治理，不依靠既定的法律規則。

根據俄羅斯特有的政治文化特質，作者從兩個面向來分析普京時期的俄羅斯菁英：網絡矩陣分類與出現時期。前者指「內圈」、「有用的朋友」、「核心接觸」與「中介或外圍接觸」；後者是指「葉爾欽時期存續者」、「普京原始團隊」、「普京第二任期加入者」，以及「普京第三任期新加入者」。在普京政權的初期，權力菁英團體集中於「強力集團」與「聖彼得堡幫」，

[49] 2019 年索比亞寧在第 15 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兩者相互競爭，是「內圈」的分裂的開端，另外葉爾欽時期的菁英中也產生了投靠者（包括「家族」與「有用的朋友」），而成爲葉爾欽時期續存者。梅普共治時期（2008～2012），年輕的「法治派」崛起，並與「強力集團」相抗衡，代表著梅德韋傑夫已經從「核心接觸」的科技官僚在發展自身的權力網絡。「強力集團」在 2012～2017 年梅普兩次換位之後獲得優勢，梅德韋傑夫繼普京任總理後「法治派」被壓抑，此一態勢在 2014 年烏克蘭事件與俄羅斯受到西方制裁與孤立後加劇，最終結果是 2020 年總理梅德維傑夫的去職。在此同時，普京所培植的第二梯隊菁英也已經出現，主要是「核心接觸」，包括科技官僚與「親信隨扈」。隨著普京展開延續本身政治生涯的佈局，這個第二梯隊的重要性逐漸增加，顯示普京想要擺脫舊菁英對其所施加的限制。因此俄羅斯的菁英似乎逐漸從兩個聖彼得堡內圈之間的競爭，轉移到「強力集團」與「核心接觸」科技官僚之間的競爭（當然強力集團也有分化）。在這個轉移中間，自由派、現代化派，與親西方的力量被擠壓消失了（「法治派」與國際派的企業寡頭）。因此，這也形成了美歐普遍認爲普京正在建立一個更加保守、更加意識形態化、更加反西方的新政權。

自 2020 年 7 月舉行憲法公投以來，這意味著俄羅斯新時代的開啓。普京目前正在對其政權進行系統改造，似乎有幾個目標：使普京主義及其價值觀永久化，解決 2024 年的問題，削弱未來總統的權力並使總統權力合法化。也許普京希望在他離開總統職位之前，藉由 2020 年 7 月通過的修憲案解決菁英間對於繼任者而相互鬥爭的問題，然而，通過賦予年輕的科技官僚菁英更多權力，普京正在將自己的 sistema 置於危機之中。年輕科技官僚的權力都是來自於普京的賦予，權力基礎來自於地位，是非常薄弱的。因此，最大的可能性，普京最後的選擇仍舊會走回當初葉爾欽選擇繼位者的決定，直接選擇來自安全部門或軍隊的強大領導人，也就是強力集團的權力精英，以確保普京主義繼續存在（Volkov & Kolesnikov, 2020）。因此，普京正在尋找一個足夠強大以控制俄羅斯，又足夠忠誠以確保自己及其盟友的安全和豁免權的繼任者。但是，國內示威、對民主的質疑、社會鬥爭正在使國家菁英階層變得脆弱，因此，未來幾年，普京總統與權力菁英之間的權力平衡可能發生的變化與發展將會得到更多的關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吳玉山，2007，〈顏色革命的許諾與局限〉，《臺灣民主季刊》4(2): 67-112。
Wu, Yu-Shan. 2007. “Yanse geming de xunuo yu juxian” [The Promises and Limitations of Color Revolution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4(2): 67-112.

連弘宜，2016，〈俄羅斯利益團體的形成與演進〉，《政治科學論叢》，68: 77-102。
Lien, Hong-yi. 2016. “Russia liyi tuanti de xingcheng yu yanji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Interest Group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77-102.

二、西文部分

Andrle, V. 1994. *A Social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London: Edward Arnold.

Avdaliani, E. 2019. “Russian Elites and Why They Matter.” in https://besacenter.org/russian-elites-why-they-matter/. Latest update 06 August 2021.

Bloomberg. 2021.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in https://www.bloomberg.com/billionaires/profiles/vladimir-potanin/. Latest update 10 August 2021.

Bourdieu, P.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1): 14-25.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NN, 2018. “The full ‘Putin list’ of Russian Oligarchs and Political Figures Released by the US Treasury.” in https://edition.cnn.com/2018/01/30/politics/full-us-list-of-russian-oligarchs-with-putin-ties-intl/index.html. Latest update 15 July 2021.

Collins, K. 2006.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ton, T. J. 2007. *Yeltsin: A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Dawisha, K. 2015. *Putin’s Kleptocracy: Who Owns Russia?*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Easley, D. & J. Kleinberg. 2010. “Strong and Weak Ties.” In *Networks, Crowds, and Markets: Reasoning about a Highly Connected World*, eds. David Easley & Jon Kleinber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7-84.

Easter, G. 2007. *Reconstructing the state: Personal Networks and Elite Identity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conomist. 2016. "Cluster Bomb: How Russia is Ruled." in 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16/09/15/cluster-bomb. Latest update 06 August 2021.

Faulconbridge G. & M. Stott. 2008. "Medvedev's Kremlin Chiefs are Putin Men."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cabinet-kremlin/medvedevs-kremlin-chiefs-are-putin-men-idUSL1323497720080513. Latest update 02 July 2021.

Field, G. L. & J. Higley. 1980. *Elitism*. London: Routledge.

Fish, M. S. 2005.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tzpatrick, S. & R. Gellately. 1997. *Accusatory Practices: Denunci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789-1989*.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renburg, D. 2020. "The Political Elite Under Putin." in https://www.marshallcenter.org/en/publications/security-insights/political-elite-under-putin-0. Latest update 20 June 2021.

Gould-Davies, N. 2020. "Three Things to Know about Russia's Constitutional Vote." in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06/russia-constitutional-vote-putin. Latest update 01 August 2021.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Granovetter, M.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Firms and Entrepreneurs".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i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ed. Alejandro Por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28-165.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Greene, S. A. 2019. "Violent Crackdowns on Russian Opposition Reveal Dangerous Policy Shift." in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19/08/crackdowns-on-russian-opposition. Latest update 06 June 2021.

Hale, H. E. 2014. *Patronal Politics: Eurasian Regime Dynam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sking, G. 2004. "Forms of Social Solidarity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rust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ed. Ivana Markov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7-62.

Hudson, V. 2015.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under Patriarch Kirill." in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russian-orthodox-church-under-patriarch-kiril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test update 18 June 2021.

Kononenko, V. & A. Moshes, eds. 2011. *Russia as a Network State: What Works in Russia When State Institutions Do No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Kryshtanovskaya, O. & S. White. 2005. “Inside the Putin Court: A Research Note.” *Europe-Asia Studies* 57(7): 1065-1075.

Laumann, E. O., J. Galaskiewicz, & P. V. Marsden. 1978. “Community Structure as Interorganizational Linkag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55-484.

Ledeneva, A. V. 1998.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deneva, A. V. 2011. *How Russia Really Works: The Informal Practices That Shape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edeneva, A. V. 2013. *Can Russia Modernise? Sistema, Power Networks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ssier, D. N. 2019. “Ideology among Russian Elites: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Belief System.” *Post-Soviet Affairs* 35(5-6): 433-449.

Meyer, H., I. Reznik, & I. Arkhipov. 2020. “For Some in Russia’s Elite, Putin’s Future Is Again a Hot Topic.” in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politics/for-some-in-russia-s-elite-putin-s-future-is-again-a-hot-topic. Latest update 15 July 2021.

Miller, W., A. B. Grodeland, & T. Y. Koshechkina. 2001. *A Culture of Corruption? Coping with Governmen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J. C. 1969.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Towns*, ed. James Clyde Mitchell.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1-50.

Monaghan, A. 2015. “Who Runs Russia with Putin?” i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4866597. Latest update 15 August 2021.

Neftegaz.ru. 2020. “В рамках помощи ЛУКОЙЛа регионам РФ в борьбе с COVID-19 в больницу г. Усинск доставлены аппараты ИВЛ.” in https://neftegaz.ru/news/society/635456-v-ramkakh-pomoshchi-regionam-rf-v-borbe-s-covid-19-v-bolnitsu-g-usinsk-dostavleny-apparaty-ivl-/. Latest update 20 June 2021.

Nohria, N. & R. Khurana. 2010. “Advancing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Nitin Nohria & Rakesh Khuran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3-25.

Nohria, N. 1992. “Is a Network Perspective a Useful Way of Studying Organizatio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ed. Nitin Nohria & Robert G. Eccle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22.

Rigby. T. H. 1990.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USSR: Central Leaders and Local Cadre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Aldershot: Edward Elgar.

Roethlisberger, F. J. & W. J. Dickson. 1939.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 2001. "Getting Things Done in an Anti-modern Society: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in Russia." In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eds. Partha Dasgupta & Ismail Serageldi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47-171.

Roth. A. 2020. "Russian Government Quits as Putin Plans to Stay in Power Past 2024." i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an/15/putin-calls-for-constitution-changes-that-would-weaken-successor. Latest update 06 August 2021.

Russel, M. 2020. "Constitutional Change in Russia: More Putin, or Preparing for Post-Putin?" i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1935/EPRS_BRI(2020)651935_EN.pdf . Latest update 15 August 2021.

Schatz, E. 2005. *Modern Clan Politics: 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stanovich, S. 2020. "The Day After Putin." i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20-03-04/day-after-putin. Latest update 08 June 2021.

Sharafutdinova, G. 2011.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rony Capitalism inside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Shevtsova, L. 2003. *Putin's Rus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putnik International. 2018.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Washington's So-Called 'Kremlin Report'?" in https://sputniknews.com/world/201801301061196283-kremlin-report-analysis/. Latest update 06 June 2021.

Stanovaya, T. 2020a. "Unconsolidated: The Five Russian Elites Shaping Putin's Transition." in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1037. Latest update 12 July 2021.

Stanovaya, T. 2020b. "The Putin Regime Cracks." in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Stanovaya_Putin_Elite-Final.pdf. Latest update 12 August 2021.

Staun, J. 2007. "Siloviki versus Liberal-technocrats: The Fight for Russia and Its Foreign Policy." in https://www.files.ethz.ch/isn/35135/diisreport-2007-9.pdf. Latest update 05 June 2021.

Steen, A. 2003. "The Network State." In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New Russia: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ower Basis of Yeltsin's and Putin's Regime, ed. Anton Stee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141-166.

Taylor, B. D. 2017. "The Russian Siloviki & Political Change." *Daedalus* 146(2): 53-63.

Tefft, J. 2020.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That Will Impact the Succession to Vladimir Putin as Russian Presiden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The Moscow Times. 2021, "Russian Parties Merge Ahead of Highly Anticipated State Duma Race." in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1/01/28/russian-parties-merge-ahead-of-highly-anticipated-state-duma-race-a72766. Latest update 30 July 2021.

Viktorov, I. 2014. "The Legacy of Tandemocracy. Russia's Political Elite during Putin's Third Presidency: Interview with the Sociologist Olga Kryshatanov skaya." in https://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872205/FULLTEXT01.pdf. Latest update 22 June 2021.

Volkov, D. & A. Kolesnikov. 2020. "Putin's Children: The Russian Elite Prepares for 2024." in https://carnegiemoscow.org/2020/02/13/putin-s-children-russian-elite-prepares-for-2024-pub-81055. Latest update 14 August 2021.

Weiss, M. 2013. "Corruption and Cover-Up in the Kremlin: The Anatoly Serdyukov Case." in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3/01/corruption-and-cover-up-in-the-kremlin-the-anatoly-serdyukov-case/272622/. Latest update 12 July 2021.

Yaney, G. L. 1973. *The Systematiz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 Social Evolution in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Russia, 1711-190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Афанасьев, М. Н. 2000. *Клиентелизм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Гудков, Д. 2015. "Чтобы сохраниться, элита должна измениться." in https://www.vedomosti.ru/opinion/articles/2015/11/05/615604-smena-elit-nepoddayuschiesya. Latest update 04 July 2021.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1992.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командная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факты. Межвуз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осква: РГГУ.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 В. 2005.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Липман, М. & Н. Петров. 2012. "Россия 2020: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 in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WP1-2012_2020_Rus.pdf. Latest update 06 August 2021.

Мельвиль А. Ю. & А. И. Никитин. 1991. "Ростки нов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 50.

Орлов, Дмитрий. 2021a. “100 ведущих политиков России в 2020 году.” in https://www.ng.ru/ideas/2021-01-11/7_8053_100.html. Latest update 06 August 2021.

Орлов, Дмитрий. 2021b. “100 ведущих политиков России в декабре 2021 году.” in https://www.ng.ru/ideas/2021-12-27/7_8337_100.html. Latest update 06 January 2022.

Рывкина, Р. В. 1999.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ак генератор конфликто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5: 12-20.

Соловьев, В. 2008. *Путин: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для неравнодушных*.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Тимофеев Л. 1993. *Черный рынок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Вильнюс и Москва: VIMO.

Ясин, Е. 2002. “Брем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1: 4-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 Analysis of Russian Power Networks and Power Elites under Putin*

*Jing-yun Hsu***

Abstract

Since the resignation of Medvedev as prime minister in January 2020, and the holding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in July 2020, experts have agreed that thi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Russia. In theory, Putin could stay in power until 2036. However, by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reorganizing the government, these moves specifically show that Putin's power networks (Putin's sistema) are facing a crisis: the power elite groups controlled by Putin in the past have established their own private networks independently. Putin has also gradually moved away from the old power elites, choosing to use young and easy-to-control technocrats instead. Russia is a network state. The Russian-style networks (blat) and power networks (sistema)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power elites under the Putin regim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Russia's unique informal networks (blat) and power networks (sistema). Afterward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the power elites under Putin with the elite network matrix and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power elite groups from 2000 until now.

Keywords: Putin Regime, Power Elites, Networks, Blat, Sistema

* DOI:10.6166/TJPS.202112_(90).0003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june0130@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